

參與之後？大陸配偶之政治行動與認同

楊婉瑩、張雅雯

國立政治大學

摘 要

本研究探討，陸配來臺在政治社會敵意及傳統性別體制包夾下，經歷認同的困惑與失落，在採取發聲行動試圖改變之後，如何地影響其集體認同，而她們和臺灣這個政治社群的關係又產生何種轉化。本研究採取 Simon 與 Klandermans (2001)「政治化的集體認同」觀點認為，行動與認同有著雙向互動的關係，權力鬥爭以及政治參與的過程，正是認同發展與重建的關鍵。透過田野研究我們觀察到，當陸配試圖改變其處境時，在這過程中，她們理解到臺灣這個政治體系的運作規則，內化社群價值，採取體系所接受的相對應的政治行動，強化了自己作為這個政治社群成員的能動性。而她們的行動是否得到體系的支持回應，不但影響她們對這個政治社群的認同的發展，也持續影響往後他們的政治參與方式。再者，陸配對臺灣的認同與行動的選擇，有著不同的連結與發展路徑，在訪談個案中，我們既看到 Hirschman (1970)所指出的積極的「發聲」與「退出」的兩種回應，也提出另一種消極「疏離」的可能回應。這些不同的認同情感與行動連結的樣態，顯示陸配的政治認同是在行動的過程中被具體化，更是異質多樣的政治化的過程。

關鍵詞：大陸配偶、政治化集體認同、政治參與、政治認同

楊婉瑩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，研究興趣為性別政治、比較政治與民主化、國會政治。

張雅雯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，研究興趣為移民政治、性別政治、政治社會化。

(收件：2018/5/31，修正：2018/7/18，接受：2018/9/25)

壹、前言

隨著 1987 年臺灣開放兩岸探親，之後允許陸配來臺定居，來臺陸配人數已逐漸成為臺灣新住民的多數族群，^① 而在兩岸政治依舊處於敵對緊張的狀態下，即使陸配在日常生活與文化上並無融入的困難，但卻在公民身分的取得以及融入臺灣這個政治社群上，不被視為一般跨國移民。無論是相關政策制訂或是一般民眾對陸配的態度，明顯受到政治認同的影響（楊婉瑩、李品蓉，2009；陳志柔、于德林，2005），使得她們比一般外籍配偶受到更嚴苛的規範與門檻。移民族群其實挑戰了這個國家的集體與政治認同，尤其當對象是陸配時，臺灣對於國家認同與主權的焦慮，往往也反應在對她們所進行的各種國境管理與監控上，使得陸配成為被排除的她者（趙彥寧，2005:67）。陸配在臺灣的處境，正突顯出臺灣國家認同的內在矛盾性，一方面在國家認同的建構上，需要敵對的陸配作為去中國化的對照她者，然而血緣的國族建構，陸配又被視為大陸地區國民的我者（楊婉瑩、張雅雯，2016:3-4）。然而，究竟陸配是她們還是我們？認同政治往往是藉由回答我們是誰以及我們不是誰來指認彼此，透過認同的分類，我們對自己以及他人的命名來確認相對位置，也確認出個人與他人的界限（楊婉瑩、張雅雯，2016:6）。

在個別的田野訪談中，當問及同為婚姻移民的東南亞和陸配，她們對於這塊土地、對國家的感受時，對於東南亞配偶而言，她們可以同時擁有雙重國家認同，既是母國人也是臺灣人，並不會有所衝突，這樣的雙重認同也較少被臺灣民眾指責不忠誠。然而對陸配來說，因為兩岸的政治與矛盾對立、國家主權的爭議，大陸姊妹們曾對我們說著無奈而茫然的心情，「好像失根的人」，「在

^① 至 107 年 6 月，我國婚姻移民人數已達 537,452 人。其中外籍配偶 181,103 人（佔 33.7%），大陸配偶 356,349 人（佔 66.3%），且九成以上為女性（內政部移民署，2018）。

臺灣不被當作臺灣人，回到大陸的家，人家也覺得你已經嫁到臺灣，也不是大陸人了」。理解陸配如何在兩個國家夾縫中掙扎與困惑，以及移入臺灣後的互動經驗對於認同的可能影響，是本文的初衷。

在臺灣，有關對移民態度的研究大多是以臺灣人的角度出發，探討臺灣民眾的國家認同與反大陸移民態度之間的關係（伊慶春、章英華，2006；陳志柔、于德林，2005；蔡明璋，2011；陳志柔、吳家裕，2017）。這些研究焦點在於臺灣民眾對於兩岸關係的認同問題，而少有探討陸配來到臺灣之後，她們和臺灣這個政治社群的關係與轉變。相對於臺灣民眾與其他移民，陸配夾雜在兩個不僅不同甚至是對立的政治實體之間，其主體認知與意識的轉變，顯然有著更為幽微複雜的過程。臺灣雙重的政治過程一排除的民族主義與包容的民主政體，提供了陸配對臺灣這個政治社群矛盾性的認同基礎。一方面，臺灣的國族建構不斷地劃分界限並進行排除，陸配經常被懷疑或是要求轉換認同，這種認同的非此即彼的單一要求與想像，經常簡化並扭曲了個體對集體的歸屬感在建構過程的複雜性。另一方面，臺灣作為民主政體同時打開了政治參與的空間，陸配不論是否取得公民身分，公民權的實踐透過政治行動的參與，都可能使得陸配在參與的過程中，持續涉入臺灣這個政治社群並提出權利的要求，進而產生新的政治社群認同。

陸配站在國族的疆界邊上，如何在我群與她群的彼此指涉下認識自己、如何影響著這個群體的行動選擇與政治認同？過去我們站在臺灣民眾的角度觀看移民者，她們不被視為我們。而站在陸配的角度，她們認為自己是誰？面對敵視與不友善的政策和社會，她們將會採取什麼行動回應，並形成怎樣的政治認同？本文將討論在兩岸政治對立、臺灣民族主義建構的焦慮與矛盾下，當陸配面對排他性的國族認同，以及民主政體提供的政治參與空間，她們所採取的政治行動，以及政治參與經驗為她們帶來政治認同的轉化過程。本文修正Hirschman（1970）的「退出、發聲與忠誠」來討論陸配對臺灣政治社群的認同以及政治行動之間的互動關係，並採用「政治化的集體認同」概念（politicalized

collective identity, Simon and Klandermans, 2001)，來分析在臺的陸配採取集體行動過程，如何地政治化其對所屬群體以及外在政治社群的認同。透過訪談分析，我們呈現出政治行動和政治認同之間的動態過程，彼此如何地相互影響反饋。

貳、她們的政治認同

國內婚姻移民議題的相關研究廣泛，然而多數關於陸配的研究，都將之置放於臺灣國族建構的框架下來理解其處境：諸如，陸配如何成為臺灣國族建構中想像的「邪惡的她者」（陳雪慧，2007）、這個過程如何地進行敵我區辨，透過指涉、區辨我者和她者的清楚位置，來建構屬於我們的臺灣國族認同（張雅雯，2014:57；曾熾芬，2004:29）、或是指出臺灣國家認同的內在矛盾性，去中國化使得陸配成為敵國她者，血緣文化的相近性又使她們又成為我們大陸地區的我者（楊婉瑩、張雅雯，2016:4）、或因著國族主義的劃界，使得陸配公民權受到不同程度的剝奪以及階層化差異（楊婉瑩、李品蓉，2009；張雅雯，2014），以及在國族政治對立的脈絡下，臺灣民眾對陸配的態度如何受到政治傾向的影響（陳志柔、于德林，2005；陳志柔、吳家裕，2017:23-28）。這些相關研究雖然不少對於臺灣國族認同建構的批判性分析，但多數仍是從「我們」（臺灣民族主義或是臺灣民眾）的視角出發，解釋陸配的困境。

過去研究較少著墨婚姻移民作為行動主體之政治認同，更少論及被視為她者的陸配的政治參與和認同，而這也將是本文關注焦點。近年來國內研究也開始關注婚姻移民的政治認同及情感議題，但對於陸配的政治認同與態度的研究仍為少數，而陸配在兩岸政治對立下，其身分更顯特殊及重要。在臺灣，她們被視為既非完全的她者（外籍人士）又非我者（本國人），從我國的法制規範可看出清楚劃分，陸配的管理機關和適用的法規皆不同於外籍配偶適用國籍法，而是特別適用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》，由陸委會為主管機關。當政治認同

往往是透過與外在對象的指涉來界定自己是誰時，對陸配而言，她們來到臺灣之後發現，自己既非被視為本國人也非外國人，而且也只是次等公民。對於她們而言，兩岸政治對立以及過去中國官方的教育下，從小接受「臺灣屬於中國的一部份」，臺灣對於陸配而言究竟是什麼樣的政治社群？對臺灣這個政治社群的認知與連結，是否隨著婚姻移動而產生改變？又產生何種新的政治社群的認同？來臺之後，他們實際的政治經驗，是否與她們以往的政治認同產生矛盾衝突？面對政治認同的衝突，她們如何回應？這些都是有待深入探究的議題。

目前國內針對陸配的政治認同的研究，多從公民身分取得、政治社會化的經驗，以及個人與家庭因素來解釋其政治認同。而這些研究大多有類似的發現：身分取得、媒介接觸、公民參與、家庭因素（夫家支持與有小孩等）都會增加陸配對臺灣的政治認同，以及陸配大多認同臺灣民主制度（李明岳，2006；潘信偉，2012；林麗雯，2004）。例如林麗雯（2004）的研究發現指稱差異往往是認同的來源，當外界越少對她們做劃分時，她們越傾向接受「臺灣人」的身分，反之區辨越明顯時，反而會加深她們對大陸人的認同。而「身分取得」是認同臺灣重要關鍵，因為國籍依舊是個人將自身和社群連結的重要象徵。然而，身分的取得，是否就自然地轉向認同臺灣？新的政治認同的內涵為何？將身分連結到政治認同的理解方式，似乎過於簡化認同形塑過程的動態，以及其中可能的機轉。

探討政治認同轉變的可能原因，李明岳（2006）的研究以陸配的政治社會化媒介接觸（如社團、媒體等）來討論她們的政治態度與國家認同。他發現參與社團（成長學苑）的陸配其公民意識和政治涉入程度較高，並且支持臺灣獨立或維持現況，以及支持民主自由的比例也會較高。此外，「臺灣對陸配的政策」及「民眾對陸配的接納與認同」也都會影響「陸配對臺灣的接納與認同」。而潘信偉（2012）的研究以政治社會化及公民參與來討論陸配的政治認同情況，並用國族認同（統／獨）和制度認同（民主／威權）建構出四種政治認同類型，研究發現小孩的有無、夫家及個人成長背景、公民參與程度將影響陸配的政治

認同轉變。他認為夫家和個人成長背景將影響陸配的政治認同方向，而有小孩則會使陸配轉變國家認同，更認同臺灣這塊土地，而公民參與較強的陸配則較肯定臺灣社會，政治認同上也會偏向民主及獨立。

這些針對陸配的政治認同研究仍為初探性研究，仍舊沿用臺灣對於國家認同的相關理論來理解被視為她者的認同，或將其認同轉變簡化為被動的條件式命題。這些對於陸配作為認同主體的形塑過程的描繪，仍是相對被動且模糊的。陸配是否可能主動建立其認同？朱柔若、劉千嘉（2005）嘗試描繪出陸配的身分認同與建構策略，他們指出認同乃在與他人的互動與外在評價過程中逐步建立，面對臺灣人將陸配視為「疏離的外地人」或「低劣的她人」等評價，陸配發展出一種汙名身分認同的建構過程，採取「同化」、「正面貢獻」，與「歸咎他人」（將汙名化群體區隔化）三種不同的策略來重塑自身的身分認同，以追求較佳的社會位置。該文結尾雖點出，陸配發展出不同的國族認同的形式來適應臺灣社會，不過國家認同僅是其身分認同的延伸（臺灣人與中國人），並非該文的重點。該文關注於陸配建立身分認同時，可能採取的認知策略，尚未觸及更積極主動的行動層面。本文希望能建立更完整的理論脈絡，描繪出陸配在國家認同的矛盾中，作為政治能動者，如何理解自身和臺灣這個政治社群的關係，以及採取政治行動之後所帶來的政治認同型態有何差異。

陸配在臺灣的公民參與或是政治行動如何重塑其認同？本文所討論的陸配不僅有社團參與經驗，且大部分有參與社會運動的經驗，這個重要的行動經驗，難以迴避和政治認同的連結，個體行動的範疇經常是被政治社群的規範所界定。趙彥寧（2004, 2006）的研究中發現，由於國家通常透過確定主權和公民身分之間的連結，藉由「本國」與「它國」既互斥又互相建構的過程來達成國家主權。就陸配而言，國家權力經常以「國家安全」為由對她們進行國境管制，同時也將其簡化為「配偶」的次等公民，國家對於這些女性公民身分的限制，也剝削了她們參與市民社會的能動性，使其成為被臺夫代言 / 被動員的角色（趙彥寧，2004）。趙彥寧（2006）的研究發現，在這過程中，弱勢族群由